

## 「清華學派」及其終結——譜系、脈絡再梳理

◎ 劉超

### 一 緣起與內涵

自二十世紀末以降，隨著「聯大熱」的興起，對晚近大學教育的研究漸成顯學；加之對知識份子的研究的繼續升溫，「清華學派」亦漸為人所關注。陳平原、趙敦恆、黃延復、齊家瑩、徐葆耕諸先生在其大作中均已提及此點<sup>1</sup>，且都強調了其重要性，但大多是一筆帶過，未及深究。究其緣由，也可理解：一是時間跨度大，史料太多；二是人物譜系龐雜多變，牽涉到的院校甚多，不易把握；此二點為直接的、學理上的原因，而第三點則為隱在的學理之外的原因，特別是涉及到某些政治歷史的因素（如「清華學派」的最後嬗變就很難從文化層面獲得完全合理的解釋）。

但是，要研究晚近學術史和教育史，這又確實繞不過這一重要的歷史存在。因為這是大學教育的變遷、政治文化嬗變的一個特寫和縮影，這不僅與清華有關，而且涉及到幾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學者。而沒有相當的史料爬梳、史實考辯，要知其大略已屬不易，要有所創獲更是難上加難。筆者對此關注有時，略有陋見，現就教於方家。

有學者認為，所謂「清華學派」是指清華文科的教學和學術風格<sup>2</sup>，此一說法自有其道理；但若質言之，它可能有著更豐富多義的內涵。筆者以為，所謂「清華學派」，至少涵蓋了如下層面：一、一個特定的學術（文化）流派；二、一種治學為文的風格（取向）和文化氣質；三、一種教育模式和辦學理念。在「老清華」中，許多理工科學者亦有相當的人文素養（如華羅庚之擅詩文、顧毓琇之精文理），善文科、有人文精神者絕不限於文科專業者，那麼，所謂「文科」也就不是一個專業意義上的範疇，而是一種素養、識見意義上的尺規。因此「清華學派」確以文科為主，但又不絕然限於文科。就此而言，「清華學派」也就隱然標示了一種新的辦學模式（通才教育）和教育理念（精英培養）。

### 二 脈絡與譜系

鄙意以為，「清華學派」不是一個學籍教職意義上的概念，而是一個思想（知識）上的譜系。此派人物也就不止於清華師生，還包括與之有關聯的一大批人，比如某些北大人士，以及西南聯大的人物。如胡適雖是長期執教於北大，卻是清華出身，且與清華研究院深有緣源；周一良雖是燕京出身，卻常在一牆之隔的清華聽課，受教於陳寅恪，且日後亦曾受陳及胡適之指教，歸國後更是就任於清華，自是躋身此中；湯用彤先生長期就職於北大，但早年為清華留美生，也與清華深有淵源；浦江清等雖出身於他校，後來也結緣於清華。——因此，對此派的外延也就不能僅從學籍教職層面去理解和框定。

在「清華學派」的發展歷程中有幾個重大事件，與之相應的則是幾個關鍵性的年份：

1925年，清華學校研究院創立，吳宓親主其事，王、梁、趙、陳四大導師先後登台，清華研究院開始運作；同年，朱自清離浙北上，落戶清華。朱於五四前後（1920年）在北大畢業，僅有本科學歷，且主事新文學創作，而無突出學術成果。朱以中學教員身份出任清華教授（年僅二十七），足見清華不以門戶、學歷為限，勇於吸收新鮮血液，接受新文化的薰陶。自此，「儒林」與「文苑」開始攜手，並存於清華。

1928年，羅家倫出長清華，力行「四化」（學術化、民主化、紀律化、軍事化），清華脫離外交部而直屬國府管轄，擴大了辦學自主權。至此，清華初具現代綜合性大學的格局，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。此後，大批文科名師持續湧入清華，並保持了長期穩定的教職，如楊振聲、蔣廷黻、潘光旦，黃節等等。其中多數是甫入清華便逕評為教授。而按慣例，教授受聘他校後最初只能是副教授。其氣魄之大，冠居全國<sup>3</sup>。

1937年，日寇橫行，抗日軍興，眾校西遷，清華與北大、南開三強合一，組成西南聯大。

1952年，全國院系大調整，地處天子腳下的清華首當其衝，由一個綜合性大學改造成一個多科性工業大學。學科建制的根本性嬗變，極大地紊亂了其文化生態；失去學科支撐的「清華學派」元氣大傷，頹勢日顯。

文革期間，「清華學派」不僅學科建制蕩然無存，且一大批「老清華」大受衝擊，離開文化崗位，或老死或病逝，或被邊緣化或被捲入政治，如陳夢家自殺（1966）、李廣田去世（1968）、吳晗自盡、陳寅恪逝世（皆在1969年）；馮友蘭、周一良等加入「梁效」，等等。

90年代前後，大批「老清華」年事漸高，政界、文界的「老清華」大都漸然淡出歷史舞台，如政界之姚依林、蔣南翔和文界之王瑤、俞平伯、吳祖緝、曹禺、季鎮淮、錢鍾書、章君宜等均告去世，「清華學派」走向終結。

大致而言，「清華學派」始於20年代中葉，終於90年代末葉，時間跨度達七十年餘年。其最主要的載體乃是清華國學院和清華文學院；文學院中，尤以文史哲諸系為最。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中，「清華學派」形成了相當完整的譜系，而這一譜系又以特定的學思傳承而形成了精密的網路。只是，在既有的研究中，對這一譜系的代際界分尚不明朗；而沒有對基本譜系的把握，就無法對其脈絡有基本的瞭解。因此，出於研究需要，筆者對此做了初步的梳理。

一般認為，朱自清先生的入教清華揭開了「清華學派」的序幕。只是朱氏「但開風氣不為師」，入得清華後才開始學術起步。因此，「清華學派」的開創並不始於朱，而是肇始於國學院的建立，其第一代掌門人當為王、梁、陳、趙四子。四人年齡相差甚大，年歲最長者為梁（1873年生），最少者為趙（1892）。其時，王、梁年約知命，而陳、趙均逾而立——這在一般學人當是治學起步期，而早慧的陳、趙二子則已進入學術豐收期（陳雖述而未作，但已然是氣象煌煌）。細言之，四人大致出生在1870-1890年前後，在清季度過了至少約二十年時間，而這二十年，一般就構成其學思的啟蒙期。他們在西學東漸的語境中，完成了各自的「童子功」訓練。這樣一個成長背景，決定了其無一例外地接受過較為系統的國學訓練，具有相當的國學根柢。此外，四子均有遊學經歷，廣讀西書，識見甚廣，這就奠定了其西學造詣。這樣，學貫古今、才兼中西的一個文化格局，就在晚近的中國標舉了一種全新的治學路

向，從而基本奠定了「清學派」的文化格局和學思境界。

這些學者雖然為數甚少，但影響極大，在1925—29年的數年中，又薰陶了一批優秀學子，從而為清華（乃至中國）後學的發展拓寬了道路。其中，王力、吳其昌、浦江清、趙萬里、蔣天樞、羅根澤、劉節、姜亮夫等，均在後一時期成為「清華學派」的悍將。

至於其時的李濟、吳宓則在學術上也已初具氣象，其學術上的大豐收將於後一階段到來。

如果說「清華學派」第一代成員寥寥，那麼緊隨其後的第二代則聲勢頗壯。此時，吳宓、李濟等人已碩果迭出。另有眾多極具水準的名師，在1930年前後都已雲集清華，且大都處於學術上的豐收階段，「清華學派」的學術豐收也就此開始。其中代表人物極多，中外文的有楊振聲、楊樹達、朱自清、馮友蘭、聞一多、劉文典、黃節、吳宓、錢端升等；歷史學中有蔣廷黻、劉崇鋮、雷海宗等；哲學方面則有金岳麟，馮友蘭、鄧以蜚等，甚至梁漱溟等人也被邀來兼課<sup>4</sup>；社會學則以陳達、吳景超、史祿國為翹楚（稍後有潘光旦、李景漢等）。這些學人，學術成型於1930年前後，而其出生時期則約為1890—1900年（黃節、劉文典略長，生於分別生於1873、1889年，學術成熟亦稍早，但調入清華時間較晚，因此，尚未躋身第一批隊）<sup>5</sup>。這代人大都在「五四」前後完成了大學的基本訓練，學術的奠基、思想的取向也在這一階段初具雛形。「五四」前後是一個極為特殊的轉型時期：武昌首義，清廷崩潰；民元之後，社會文化基本處於激進化的轉型中，在這向左轉的過程中，青年群體尤為激進，大都體認出「激烈的反傳統」取向。在此背景中，他們接受了國內的學術訓練，獲得初步啟蒙後，又負笈海外（多為歐西）接受系統訓練。經數年之醞釀，學術已開始起步。因此，他們大都專心治學，有相當的專業素養，亦不乏公共關懷，其中一些人構成了二三十年代「新月派」的骨幹<sup>6</sup>。

當然，以上只是一個基本的年齡段限，並不排除年青後生的崛起。此中，有一個異數，便是張蔭麟（1905年生）。此公屬於早慧的天才，年僅十六便入清華，此後幾年中在《大公報：文學副刊》、《清華學報》、《學衡》等一流刊物上發表大量文章，並於1925年前後初露大家氣象，開始了其學術豐收期。在「清華學派」的譜系上，他也與馮、金、朱、聞諸子同屬第二代。可惜的是，此君家境貧弱，用力過勤，不善惜身，為情所傷<sup>7</sup>，天不假年，在第四代學人碩果漸豐之時，不幸病歿<sup>8</sup>。

其時，曹雲祥、羅家倫、梅詒琦等相繼主事清華，從全國名校網羅名師（多為全職），並吸納大量歸國留學生。此等氣魄，在南北各國立、私立名校中，絕無出其右者。

以年度計，主要有：

1922：梁啟超、陸懋德

1924：錢端升、吳宓

1925：王國維、陳寅恪、吳宓

1928：楊振聲、劉文典、俞平伯、陳福田、錢稻蓀、馮友蘭、鄧以蜚、馬衡<sup>9</sup>

1929：黃節、蔣廷黻、葉公超<sup>10</sup>

1930：傅增湘（沅叔）、溥侗、羅常培、徐耀辰、楊宗翰、許地山、張崧年（申府）、商承祚、顧頡剛<sup>12</sup>

1932：聞一多、雷海宗、許維通<sup>13</sup>

1935：潘光旦<sup>14</sup>、李景漢<sup>15</sup>

以學校計，則為：

北京大學：梁漱溟、劉文典、鄧以蟄 燕京大學：楊振聲、馮友蘭<sup>16</sup>、顧頡剛

南開大學：蔣廷黻、劉崇鋮、雷海宗、李濟<sup>17</sup>

北師大：楊樹達<sup>18</sup>

東南大學（中央大學）：吳宓、葉企孫<sup>19</sup>、顧毓琇<sup>20</sup>

這表明，其文、哲二系主要借師於北大、燕京諸校；史學系班底主要「搬」自南開，而理工科則假手於東大。在此後二十來年中，吳宓為清華培養了萬千英才，而葉企孫則為清華栽培了近百名院士（學部委員、外籍院士），開創了中國數理學界的半壁江山，這定然冠絕中國<sup>21</sup>。

至此，大批中堅人物悉數到場，清華文科的基本格局基本奠定，其特徵為：大師辦學，名師執教，文理兼顧；國學與西學並重，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並舉。「清華學派」的氣象日漸呈現出來。

此後的第三代人則在1935年前後起步，他們大都生於1900–1910年（集中於1905年前後），20年代就讀於清華，多為清一色的清華留洋歸國生，如王力（1900年生）、賀麟（1902年生）、雷海宗（1902年生）、陳銓（1905年生）等。另，俞平伯、蕭滌非、余冠英等也與清華深具淵源。此代人年歲略近前代（如俞與朱自清素有交誼，且僅小二歲），但仍屬後一批隊，主要是因其學術成熟稍晚，且受教於前二批隊，與之有師承關係。此時身為陳寅恪門生的浦江清、吳其昌等人開始學術豐收，受教於趙元任的王力、吳宓門下的賀麟、陳銓已學有所長。同屬清華出身的林同濟（1906年生）此時尚在海外，但後來也與賀、雷、陳構成「戰國策」派四驍將。與之相應的，在文學方面，則有「清華四子」（朱湘、饒孟侃、孫大雨、楊世恩）<sup>22</sup>、李健吾<sup>23</sup>和曹葆華等<sup>24</sup>。

稍後的第四代則為全新的一代，他們大都於30年代在清華園受教育，如文學院「四才子」之三錢鍾書（1933屆）、夏鼐（1934屆）、吳晗（1934屆），以及「清華四劍客」李長之、林庚、季羨林、吳組緝，另有曹禺、楊絳、楊聯陞、費孝通、王瑤、馮契、史國衡、趙儷生、何炳棣，另有出身他校的吳於廛、張岱年、陳夢家等<sup>25</sup>。清華資深教授吳宓的「龍虎豹」之二（錢鍾書、曹禺）都湧現於此時，共和國史上鼎鼎有名的「二喬」（胡喬木、喬冠華）「三錢」（錢學森、錢三強、錢偉長）也出現於此時。此派人物，大多生於1910–1915年間，成長於一個急遽變革的時期，但受過極好的訓練，並未荒廢學業。其學術多起步於40年代，正逢動亂。此後數十年社會不穩定，這對其研究不免有負面影響，多少滯緩了其學術收穫期。<sup>26</sup>所幸其中不少學人，天假其年，得享高壽，因此在晚年仍梅開二度，重煥「學術第

二春」，如錢鍾書、季羨林、費孝通、王瑤等。這批學人對此後新中國數十年的學術產生重大影響，1978年後最初的一大批學界領袖、資深教授，多是這批人（80年代最初的一批「新生代」學人也多為其門生）。這也是清華歷史上大家湧現最多的時期之一。此後，學術界在數十年中專家甚多，但再難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有原創性（有開創性和總結性）的大家，此後數十年都再未走出「後大家時代」。

其間有一批人深受「新啟蒙」影響，在「一二五」前後走上了社會政治革命的道路，成為數十年後中國政壇的明星，如「二喬」、姚依林、蔣南翔、於光遠等。當然，以學一政二分的眼光看，這與規範意義上的「清華學派」已有距離。

緊接此後的是西南聯大。聯大八年，三強合璧，傲視海內，人才出爐率亦奇高。有一大批生力軍為日後躋身「清華學派」做好了必要的訓練，學術中有殷福生（海光）、鄒讜、王浩、季鎮淮、任繼愈、黃楠森、王永興、張世英，以及朱德熙、王棊、袁方、羅榮渠、李賦寧、許國璋、楊周翰、王佐良等；而文學一途，亦有卞之琳、汪曾琪、馬識途、穆旦、鄭敏等，他們都已先後完成了其學術或文學上的準備，正走向成名成家之路<sup>28</sup>。此代人大致生於1915—1925年間，但是，天不遂人願：1949年，他們年約而立，而這本該是一個學者的起步階段；1957年他們多近不惑，這本該是一個學者的豐收時期；1978年後，他們已漸入暮年，這是文科研究的成熟期，卻是個體生命的衰老期。幸有一批人堪稱頑健，在1978年後再度出山，與前一代聯手，演繹「夕陽紅」（文人如汪曾祺等亦如此）。

此為末代「老清華人」，他們與前一代共同構成了三十年後中國知識界的元老。不同的是，他們大都囿於時勢，命運多舛，接受過最好的「童子功」訓練，但極少有緣留學深造<sup>29</sup>，且在生命中的幾乎每個重要關頭都未逢其時，屢遭磨難，蹉跎歲月。執是之故，此代學者後天不足，專業造詣略遜前代，基本上難以出現真正的大家，且在此後基本上長期被「改造」，其成長困難可想而知。

儘管如此，仍有一大批人經過卓絕努力而有所建樹，實屬至為不易。細言之，此「末代人」有幾大特點：

一、在學思境界上，一般都多專家而少大家。原因如前所述。

二、在學科分布上，基本集中在人文學科（與文史哲、語言學），而社會學科則寥寥無幾，鮮有政治學、法學、經濟學、社會學等方面的人才，相對而言，作為法學家的肖蔚雲與作為社會學家的袁方，當為其中有數的社科名家。其原因不在聯大之培養，而在50年代社會科學的被取消，使年青學人學無所用，久費成荒。作為資深學者的陶孟和、陳達、費孝通（社會學人類學）、錢端升、樓邦彥（法學）、羅隆基、王造時（政治學）、陳序經、陳岱孫（經濟學）等人（多為清華人），大都處境不佳，或被邊緣化（相當一部分淪為「右派」）。這與出身延安的紅色文化人的境遇適成反差<sup>30</sup>。相反，雖為民主人士卻轉事左翼的馬寅初（經濟學）則境域頗佳。

三、此代學人中留在大陸者與留學海外者差別甚大，如王浩、鄒讜，以及此前的楊聯陞、何炳棣等，大都較多地發揮了各自的學術個性和專長，而留在大陸的學者則一度困於時勢。同是主事哲學的聯大人，殷海光與何兆武、黃楠森就差別甚大；極具詩才、頗具氣象的穆旦也滄桑歷盡，最後英年早逝。

四、此批學人中為以後培養和保留了一大批外語人才，如王佐良、李賦寧、許國璋、楊周翰

等。這為三十多年後中國西語人才的培養保存了火種。

### 三 源流與變遷

如人所言，老清華的美化程度甚高，海歸派佔相當比重<sup>31</sup>。清華學派確乎深有西學背景，但與國內其他名校關係亦頗密，其中主要是北大、南開及東大南高（中央大學）及私立的無錫國專。清華與北大、南開關係之深自不必說；與東大亦較有瓜葛，領導如羅家倫、顧毓琇、吳有訓，教授如吳宓、梁實秋、浦江清、陳夢家等均結緣二者。清華與中山大學也關係甚密，如王力兼長中大文學院，從而創立了國內第一個語言學系；後來陳寅恪亦南下轉事中大。

因此，所謂「清華學派」，就不只是「清華的學派」，而是中國大學體系（知識界）中的「清華學派」。

既然「清華學派」不完全是學籍、教職意義上的概念，那麼，它到底是怎樣的觀念呢？這要對其譜系做一細察。從其譜系來看，該派成員來源主要有三：

一、出身清華的文人學者。此中多為「老清華」，少數是在他校讀完本科（或同等學力）後轉考清華研究院（特別是東大、北大和無錫國專的畢業生），<sup>32</sup>但這為數甚少，因國學研究院前後四年僅七十多名畢業生<sup>33</sup>，僅半數於其時清華每年所招本科生；也有極少者為他校轉學到清華讀本科的（如在北大預科畢業後考清華）。

二、在清華（含聯大）供職的文人學者。事實上，這一批教師約有半數出身於清華；另有一些是他校畢業後任教於清華的，如北大、南開、東大（南高）等。其中，有一部分外籍教師也可躋身此列，如吳可讀（Pollard）溫德（Winter）、噶邦福（Gapanovitch）等。

三、與清華學人私交較密、因緣較深的其他學者。此一部分隻佔極少數。

因此，「清華學派」成員的主體仍是清華學生與教師，易言之，清華本身即是「清華學派」的人才基地，而北大、南開、東大、無錫國專等則構成其基本的預流。如是一來，「清華學派」便有源有流，有「派」可「流」。

抗戰以後，三校雖言北還，但局勢日亂，1949年大批人員南下，多少削弱了清華的力量。三年後，局勢驟變。院系大調整中，國立大學一家獨大，教會大學、私立大學漸告終結。地處京師的名校首當其衝：燕大、輔仁等被撤並；清華、燕京的文科被歸併至北大；燕京、輔仁已付闕如，清華成為巨型的純工科學大學，北大則為老牌的文理大學。外界強力以其銳不可擋之勢，衝擊了文化生態，改變了中國的文化格局。是時，頗有淵源的「中國人民大學」已破土而出，成為社會主義的紅色聖地<sup>34</sup>。京城高校出現了「人北清師」的格局<sup>35</sup>。

文科編制的撤銷，基本消除了「清華學派」賴以存在的文化土壤。「清華學派」氣脈大亂，亂相頻生，五代而衰。此後的清華文科凋零殆盡，面臨著重生之大任。

### 四 內涵及其表徵

以上的譜系梳理，可以見出「清華學派」之內在實質與精髓乃在於「獨立之思想，自由之精

神」。這是陳寅恪頌王國維之語，但又何嘗不是夫子之道或「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」呢？第一代掌門人開創的學風在此後得到了貫徹，清華學派由是薪盡火傳、生生不息。

上述分析，折射出該學派的基本特徵：

## 1 譜系極完整，延續性極好

這與老清華特有的人才機制有關：領導求賢若渴，教師愛才如命；一方面「培養優秀人才」（學生），另一方面「留住一流人才，吸引傑出人才」（教師）。因此，師生共進，人才輩出。但這有賴於兩方面的因素：一是清華學生凝聚力強，有共同氣質；二是清華教師重視教學，隊伍穩定——這在教師流動性極大的民國時期，其穩定性可能是獨有的。20年代中葉，五四落潮後的北大有大量名師南下滬寧穗漢諸地<sup>36</sup>，而清華文科建制日進，規模日壯，處於上升階段，大量名師湧入清華，極少有人捨清華而取他處<sup>37</sup>。而且，這種「有進無出」的態勢一直維持了數十年，直到後來才橫生逆轉。

名師的雲集，使其學派極為完善。陳寅恪等人影響了幾代學人，特別是國學院的幾乎每一屆學生，且對此後的錢鍾書、季羨林與周一良影響亦深；身為國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更是重視教學<sup>38</sup>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先後指導了蕭滌非、王瑤諸人；聞一多不僅培育了季鎮淮，還提攜了此後的朱德熙等；吳宓、陳福田門下除了二三十年代的「龍虎豹」而外，還直接培養出李賦寧等人，而李氏又為數十年後中國外語教學的發展貢獻巨大<sup>39</sup>。

當然，該特點的深層原因乃是老清華的體制優勢。一是**選拔機制**上，常規與破格相結合。老清華素以擇才極嚴著稱，但對特別優秀的人才，也可「不拘一格選人才」。如錢鍾書數學僅得十五分，而中英文特優，清華予以破格錄取；華羅庚亦無正規學歷，但熊慶來慨然允其入學；吳晗也被胡適推薦至清華；錢偉長英語考試不佳，未被北大錄取，而由其叔父錢穆推薦到清華。二是**晉升制度**上，不惟資歷、唯才是舉。本國教師與外國教師、本校出身與外校出身平等對待，對優秀教師敢於直升教授。三是**福利制度**極為優渥。按清華制度，本校教授每五年可有一次定期帶薪休假出國進修（如朱自清於1931年開始的「歐遊」即是如此）；這在其時亦是絕無僅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「清華學派」中相當多人出身清華，但基本上克服了「近親繁殖」的錮弊，這也與其用人機制有關。一般說來，教師的延聘途徑主要有：一、清華畢業後留校助教，漸次晉升（如吳其昌、李健吾、林庚、王瑤、季鎮淮、朱德熙）；這只佔一小部分。二、清華畢業後放洋深造，然後回校供職，如「庚款留學生」趙元任、胡適等，以及吳宓、聞一多、賀麟、張蔭麟、錢鍾書、費孝通、華羅庚、陳省身等；這一部分比重最大，大多成為三十來歲的少壯教授，事實上構成了後期的中堅。三、本校畢業生在外校任教（任職）後返聘回清華，如羅隆基等。四、從它校（包括國外）延聘。其中，北大出身者最多，如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劉文典、馮友蘭等；另，南開、東大出身者也相對較多；長期服務於清華的外教亦不鮮見。

## 2 以年齡言之，具有年輕化趨勢

一般而言，在早期的清華，學生入校時多為十五歲左右，七八年後二十出頭即放洋深造；數年後即獲得碩博學位，學有所成後即回國，此時仍年未而立。一流的本土教育，一流的歐美

訓練，造就了一流的學人。因此，他們大都成為年約三十的教授，如早年放洋的胡適、聞一多、梁實秋等，這批人皆為人傑，屬學界一時之選。在改行新制的清華大學，學生入學時多為十七八歲，但學制僅四年，多數畢業生仍可在二十出頭就留洋，「海歸」後也不過三十來歲，很快可以晉身教授。如：李濟二十七歲始任教授；葉公超1929年初抵清華就任教授，年僅二十五；賀麟歸國後任北大教授，年僅三十出頭；張蔭麟歸國後為清華教授，年僅三秩晉一；沈有鼎與張蔭麟同時晉為教授，年僅二十八<sup>40</sup>；陳銓升為教授時，年僅而立<sup>41</sup>；「本土派」張清常升任教授時，年僅二十九<sup>42</sup>；至於錢鍾書，更是在二十八歲就受聘為教授；邵循正、任華等人也都在三十歲左右升為教授。甚至「本土派」的余冠英、蕭滌非也在三十多歲就獲得了教授。對外校出身的也一視同仁。出身東大的陳夢家號曰「史學天才」，也在三十出頭榮升為教授<sup>43</sup>。及至聯大時期，佔半壁江山的清華學人，也多是留美博士出身。清華北還之後，李賦寧、與楊絳（季康）均被聘為教授，李僅三十二，楊亦年方三十八，實屬相當年輕的女教授。至此，錢氏夫婦均為清華少壯教授。<sup>44</sup>即便是1952的院系調整後，王瑤也以其卓異的成果而被評為北大教授，年僅三十八。一旦評上教授，學者便無太多職稱、生計之憂，便於專心教研。毫無疑問，這樣一批三十來歲的教授確保了「清華學派」持續強勁的後勁。

不僅如此，「清華學派」在外校亦影響甚巨。例如，抗戰期間，成都燕京大學有所謂「四大名旦」，即陳寅恪、吳宓、蕭公權、李方桂，無一不是此派中人<sup>45</sup>。其時，清華出身的端木蕻良，1938年就任復旦大學教授時，年方二十六。

因此，在全國範圍來說，「清華學派」擁有一批最年輕、敬業的實力派教授，這就類於「五四」前後的北大，擁有一批年輕才高（平均三十來歲、有留洋背景）的教授，當是最有活力的。所不同者，只是當時北大的「五四青年」熱衷於「談政治」，「讀書不忘救國」；而清華少壯派則是安心於「做學問」，「救國不忘讀書」。而此時，清華的年輕教授、外籍教師的比例，均為全國之首。

### 3 以學風論，兼顧文理；兼修文（化）體（育）；兼資人文社科；兼通古今中外。要求既嚴，素質亦全

這在清華的課程設置上就可得到反映<sup>46</sup>。清華極重文理的交融和文（化）體（育）的兼顧（如梁實秋就因體育未及格而推遲一年畢業，錢偉長也因體弱而差點被拒收）<sup>47</sup>。文學人多才多藝，如聞一多的擅書法和金石篆刻；不少以理科為業的學人也兼擅文史，如華羅庚、顧毓琇等，這也並非罕見。

清華重新學而不輕舊學，興西學而不廢國學。重西學，首先是重外語。早年清華教育中極重外語，其對外語要求之嚴，是素享盛譽的；加之早年只招一二百人，所以往往只有極少數外語極好的學生才能入讀清華。清華研究院也以其極高的外語和國學的要求讓人嘆服<sup>48</sup>。後來，大學部只還一度力倡學生們兼修第二外語。及至聯大時期，清華文科研究所畢業生均須通過第二外國語考試<sup>49</sup>。這樣的一種氛圍，催生了大批通曉多種外語的奇才：老一輩的陳寅恪、趙元任、湯用彤，稍後的梁實秋、更年青的邵循正、錢鍾書、季羨林（甚至周一良）等人，都兼通六七門甚至二十餘門外語。這種現象，作為個案的出現可能有其偶然性，但作為普遍的現象，也許就有其體制上的必然性。當然，重西學（洋化程度高）的同時，也不輕



「國學」。這種文化氛圍和辦學（教學）模式鑄就了一大批通才和大家。執教清華的教師中，橫跨數學科的人亦不為少，如陳寅恪長期兼跨國文系與歷史學系，還曾一度兼課於哲學系；錢端升二十五歲則兼事外文與歷史學兩系<sup>50</sup>；張蔭麟二十九歲就兼任哲學系與歷史學系教師<sup>51</sup>。「本土派」本科畢業的李長之，二十餘歲就在一流名校中承擔了文史哲藝、中外文的教學；<sup>52</sup>吳澤霖亦曾兼任社會學與人類學兩系教授<sup>53</sup>。於今而言，兼通文理，精通外語，幾乎是成就大家的必備條件。這就可以解釋，為甚麼此後數十年中，成就卓異大家中，幾近半數都出自老清華。

#### 4 兼盛文藝與學術

清華國學院草創之初，即強調要「研究高深學術」<sup>54</sup>，此與北大（「研究高深學問」）相近<sup>55</sup>。如果說最初的（留美）預備部還多有「預備」性質的話，那麼稍後創立的大學部（本科及大學院）則貫徹了這一宗旨。大學之要乃是研究學問（學術），但多才多藝的「清華學派」成員，卻並不以「學術」自封。他們不僅是精於學思，而且是才學兼勝；既精於學問，亦長於詩文。事實上，清華研究院及清華文學院的多數人物都盛產詩文，且品質不低。此中自以中文系最盛，數十年中歷任系主任幾乎皆為文章大家，吳宓、楊振聲、朱自清、劉文典、聞一多、李廣田大都如此。吳學兼中西，文章亦好；朱一直專事創作，在五四前後已是新文學名家，創作實績斐然；劉既是文史大家，亦是古文高手；聞早年已是清華才子，後為新詩名手、「新月」派悍將。日後出長清華的李廣田雖說學歷略淺，創作、評論卻是成就頗豐，散文尤工。國文系的教師們亦復如此：俞平伯不僅以古典文學研究見長，年方弱冠即為知堂門下之才俊，與廢名等人並為「四弟子」，與朱自清同為新文學名手；放洋歐西、復又任教清華的王力亦是隨筆名家，曾同時為數刊物開專欄<sup>56</sup>；陳夢家與張蔭麟並稱「史學天才」，早年即與聞一多同為「新月派」鉅子，二十歲便出詩選，後又以古文字學名世。出身清華、供職別處的曹葆華、端木蕻梁亦是此中代表，不僅長於創作，亦頗有研究。身兼文史二系教授的陳寅恪，則尤善古詩；張蔭麟治史極有創獲，早年已是與錢鍾書齊名的文論奇才；年青才俊的吳晗深研明史亦工於雜文。外文系陳銓精於德文，卻於翻譯、文論、政論無不擅長；卞之琳等更是年歲輕輕而久享文名。當年「清華四劍客」（季羨林等），在數十年後都成為有數的才學兼勝的大家。吳宓門下的弟子多有通才，不僅長於創作、亦精於翻譯。當然，更令人稱奇的是那文學院的「才子」錢鍾書，作為一代大家的錢鍾書，更是罕有的奇才。

「清華學派」才學之全，造詣之高，影響之大，都是極為罕見的。當然，上述諸特點的形成，其基礎乃是清華本身的精英教育優勢。這與其說是人為努力的結果，不如說是天賦地利的碩果。以20年代前期而論，清華每年招生數不過一二百，而報考者則在萬人以上<sup>57</sup>，這種約百分之一的錄取率，從根本上保證了清華的生源品質。而保持低錄取率，正是創建一流大學的基礎之一。若無一流生源，再多名師巨匠也徒歎奈何。惟有名師育英才，才可保障這種教育模式的運作；沒有低錄取率，何來高成才率？

#### 5 專業精神與公共關懷

清華學派雖崛起於「五四」之後，但仍秉承了五四精神。學人們治學甚勤著述極豐，卻並未藏身書齋、埋首故紙堆，在專業之外，他們也關心民瘼。雖然其政治觀點可以商榷，但其公

共情懷不可抹煞。如果說五四前後是北大獨領風騷，那麼三十年代前後則是清華不甘人後。五四以降，學（文）人間政者甚繁，其中北大最是活躍，先後有過「新青年」、「新潮」、「獨立評論」等派；相應的「新月派」及「戰國策」派則是清華學人的動作。二十年代的「好人政府」基本上是北大學人的政治實踐，而後來的政治實踐就多了清華的身影。其時，在「談政治」或「幹政治」中，胡適、張君勱、王世傑、王寵惠、丁文江、羅隆基、蔣廷黻、吳景超、翁文灝、陶希聖、顧毓琇、何廉等都曾涉足，這其中就有不少與「清華學派」素有淵源。

此外，「清華學派」也有「相容並包」之氣度。這不僅表現在內部的寬容上，而且重要的一點是善於聘請外校教師來兼課。如梁漱溟自不必言，就職於北大的錢穆等人也常被邀為講座<sup>58</sup>或授課<sup>59</sup>。1936—1937年度，清華歷史學系出於學科建構的需要而設「中國地理沿革史」，但本校並無史地研究的專門家，因此特從校外聘來譚其驤（燕京畢業），此時譚僅二十六歲<sup>60</sup>。——我們知道，五四前後的北大，浙、皖兩派勢力奇大，乃至於讓極具能量的蔡元培也不易制衡；特別是其時的國文系，馬氏兄弟、沈氏兄弟、周氏兄弟等章（太炎）門友徒幾乎左右了全系，讓外人極難入足<sup>61</sup>。

由此可見，如此穩定的名師隊伍，如此年輕的教授團隊，如此優質的精英培養，如此寬鬆的文化氛圍（教授治校），為「清華學派」的發展奠定了無與倫比的基礎。

## 五 尾聲：嬗變與終結

長期戰亂，導致基礎教育薄弱；加之擴招，大學生源亦受影響。清華亦不例外。1947年，「教師人數減少，學生人數激增」，「學生程度比戰前稍差，此為全國學生普遍現象，任何學系皆然」<sup>62</sup>。時勢對教研影響日增，正常教研安排極受影響。五年後，清華、燕京文科併入北大。「清華學派」的學（文）人不復如初，悉數肢解到北大、科學院等處，學派之「流」被腰斬。

如果說1952年的院系大調整只是在學科建制上根除了「清華學派」的根基，剷除了其文化土壤，那麼，此後數十年的人事代謝，則在人脈上消解了「清華學派」的傳承。從此，「清華學派」漸成歷史，但見故人去，未見新人來。嬗變既已開始，終結可豈避免？

1949年，一批資深教授遠走海外（如胡適、羅家倫、蕭公權、李方桂等），亦有青年學子遊學歐美，從此再未歸國（如楊聯陞、何炳棣等）。儘管如此，其在譜系上仍屬「清華學派」，且基本上貫徹了「獨立、自由」之精神。因此，「清華學派」在海外猶有餘脈，薪火殘存。但是，時光流逝，作為正宗「清華學派」傳人的那幾代人年歲漸長，先後離世。雖然他們大都學有傳人，如蕭公權之傳汪榮祖、楊聯陞之傳余英時、殷海光之傳陳鼓應，海外學界亦有數「小虎」<sup>63</sup>，說來，雖與「老清華」不無淵源，但離真正的「清華學派」已太過遙遠了。及至今日，真正意義上的「清華學派」，在海外已是餘脈漸絕，薪盡火未傳。

1949年，原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遠赴北美；1969年，另一導師陳寅恪病歿廣州，國學院導師盡去，「清華二龍」僅餘其一；1978年，原國學院主任吳宓病逝。至此，清華研究院故人俱盡。四年後，吳宓門之「虎」（李健吾）病故；十四年後，吳門之「豹」（曹禺）西歸；又二年，吳門之「龍」（錢鍾書）駕鶴西歸。「二龍」俱失，「雛龍」安在？！國學院已成往事，文學院亦然歸塵。

1984年，金岳霖去世；1988年，梁漱溟去世；1990年，俞平伯去世，老清華「首席院長」馮友蘭去世；至1994年，「清華四劍客」已折其半。2001年，周一良去世。至於學派的其他傳人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昏黃。作為個體的某些老清華人仍然存在，只是，作為「學派」的碩學鴻儒「老清華」，已然不復存在。

事實上，早在1998年錢鍾書先生的逝世，便已宣告了「清華學派」的終結。

## 註釋

- 1 分別參見以下資料：陳平原《大學十講》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）；黃延復《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》（廣西師範大學2000年版）；黃延復《水木清華：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》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，以下簡稱《水木清華》）；齊家瑩編《清華人文學科年譜》（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，以下簡稱《年譜》）；徐葆耕《釋古與清華學派》（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），《紫色清華》（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）；謝泳《大學舊蹤》（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）等。
- 2 見「朱自清的文學活動」，《水木清華》頁401。
- 3 當然，這與清華獨特的晉升、福利制度和選才機制有關，而且也有賴於必要的客觀條件。其時北京有「師大窮，北大老，清華燕京可通融」之謂，足見清華財力之頗厚。
- 4 1927年1月18日，國學研究院舉行第七次教務會議，會上，梁啟超提議請「對於儒家哲學研究頗深，現正研究『人心與人生』問題的梁漱溟」來校做長期演講，於是，聘梁為專任講師，任教一學期。而我們知道，梁不僅三十出頭，亦無正規學歷。見《年譜》頁45。
- 5 《年譜》頁90、69。
- 6 需注意的是，十餘年後的「新月派」中胡適、梁實秋、聞一多、徐志摩、羅隆基、潘光旦、餘上沅等幹將無一不是清華人。他們都在「五四」前後數年中完成各自的思想啟蒙和訓練。因此，其中可能有一個潛在早期啟蒙背景。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者，在後來「談政治」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姿態，顯然有「五四」「新青年」這樣一個遠在而潛伏的背景，這可以說是其早期思想的餘脈和迴響。
- 7 關於張早逝的原因，一般學者只歸諸身體因素；劉夢溪先生在考辯賀麟先生的著作時，則指出：張早年單戀十來年，心受鉅創；婚後又生婚外戀，因此，張氏以情傷身。見劉夢溪《學術思想與人物》頁384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。
- 8 《年譜》頁14。
- 9 《年譜》頁68及69下注。
- 10 《年譜》頁87、89下注及頁90。
- 11 《水木清華》頁120-121。
- 12 《年譜》頁97-99。
- 13 《年譜》頁121、122。
- 14 《年譜》頁155。
- 15 《年譜》頁170。
- 16 蔡仲德《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頁67-68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。
- 17 《年譜》頁11。
- 18 《年譜》頁37。

- 19 「葉企孫——清華物理系的締造者、理學院的奠基人」，《水木清華》頁79-86。
- 20 「顧毓琇——廣識博通的工學院院長」，《水木清華》頁86-92。
- 21 同上注15。
- 22 見「清華新詩歌」，《水木清華》頁433。
- 23 《水木清華》頁420。
- 24 《水木清華》頁446
- 25 其時清華其他方面亦是人才輩出，如「二喬」、「三錢」（錢學森、錢三強、錢偉長）何澤慧、華羅庚等，蔣南翔、姚依林、於光遠等日後亦成為重要人物，文學方面則有端木蕻梁、韋君宜等。
- 26 當然，這也是因人而易。社會動盪對那些事業早成者（如錢鍾書）或移居海外者（如楊聯升）則影響較小，但大多數學人尚無此幸。
- 27 當然，此時再度出山者並不僅止於「清華學派」，亦有一批與北大淵源甚深的人物，如張中行、金克木、鄧廣銘、程千帆等。另有其他學人如周谷城、鐘敬文、施蛰存、錢仲聯、徐復、周予同、何茲全等等。
- 28 與文科相應的則是大批理工人才的湧現，特別是「物理四傑」（楊振寧、李政道、鄧稼先、朱光亞），尤為引人矚目。
- 29 筆者在查閱原始資料時，發現此間出國深造主要是理工科學人。而此前的清華「三錢」、聯大「物理四傑」無一例外都赴美接受過一流訓練。域外的訓練對學者成長的意義於此可見一斑。見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》（教職員卷），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。
- 30 同為經濟學人的陳翰笙、薛暮橋、孫冶方、于光遠諸子的境遇，與前者適成比照；號稱「學者」的陳伯達更是一度大紅大紫炙手可熱。此中況味，自可體味。
- 31 見謝泳《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》頁6，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。另可參見謝著《逝去的年代》（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版）及高增德、趙誠、智效民、丁東等人的有關著作。
- 32 以1925、1926年計，共取學生60人（含備取6人），以母校計（不含1926年度備取生4人），東大畢業生8人，北大2人，無錫國專2人。見桑兵《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》頁145。其時，清華大學部年招本科生約為150人。其中，1925年為132人（報到93人）。見《年譜》頁11。
- 33 見趙敦恆《清華國學院紀事》，載《清華漢學研究》，第一輯，頁340。
- 34 有關情況，參見周成旺《使命：中國人民大學的世紀傳奇》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。
- 35 見阮宏林等著《我崇拜 我批判——穿行在人大的歲月裏》頁4，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。
- 36 如1919年陳獨秀去京回滬，1926年胡適、魯迅均離開北大；1927年李大釗被捕犧牲。足見新文化領袖此時大都風流雲散。1925年前後數年中，其他學人亦紛紛南下，以文科諸系論，則有梁漱溟（1924）、吳梅、黃侃、黃節、林語堂、徐志摩、陳源、顧頡剛等碩學名師。名師之流失，無異於大學之「失血」。因此，廿年代中後期京城氛圍一度低迷，而此時清華卻開始崛起。
- 37 當然，這並不排除極少的例外，如1936年7月2日清華的評議會就決定解除張申府的聘約，原因乃是張對「時事」介入太深。1940年，張蔭麟嫌清華待他不公而去浙大。分別見《年譜》頁188、14。
- 38 1942年下半年，朱授新課「文辭研究」，雖只一二人選課，但他從不缺席、遲到，且認真為學生改筆記。他極不同意教師只「研」不「教」，認為：文化是繼續的，總應該為下一代人著想，如果都不肯為青年人服務，下一代怎麼辦？見《年譜》頁267。
- 39 見辜正坤《於無聲處悼李賦甯先生》，《北京大學校報》2005年1月5日。另，可見《松竹氣韻 星月心境——林庚先生喜過九十五歲生日》，《北京大學校報》2005年3月5日。
- 40 《年譜》頁186。

- 41 《年譜》頁10、175。
- 42 《年譜》頁156、303。
- 43 見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員名冊」，上引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》（教職員卷）頁134、181。
- 44 《年譜》373。
- 45 見智效民《想起蕭公權》，《胡適和他的朋友們》頁166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。
- 46 老清華素來注重總結辦學得失。早在1931年，朱自清在《中國文學系概況》中說：「我們只定英文為必修，似乎不夠用。下年度想增設第二外國語……」蔣廷黻在《歷史學的概況》眾說：「清華的歷史學系向來是合中外歷史為一系的，並且是中外歷史兼重的。」「清華歷史系，處理兼重中外史以外，還有一種特別：要學生多讀外國語文及其他人文學術，如政治、經濟、哲學、文學、人類學。『多識一種文字就是多識一個世界』。」這不止是空喊口號，而是力行貫徹，後來清華史學奇才的湧現就印證了這一點。見《年譜》頁106、107。
- 及至1936年6月27日，馮友蘭在《清華週刊》嚮導專號上載有《文學院概況》一文。內中說：「本院各系……於課程中，除各系專門課程外，尚有各學院一年級公共必修課程。在此公共必修課程中，有自然科學及中國通史、西洋通史等課程。」僅此可見一斑。見《年譜》頁187。
- 47 詳見各期《清華校友通訊》（清華大學出版社），其作者多為老清華校友。
- 48 關於此點，可參見桑兵「陳寅恪與清華國學院」，《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》頁136-160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；另，欲深究其源，可參見羅志田《國家與學術：清末民初的「國學」論爭》，三聯書店2003年版。
- 49 《年譜》頁311。
- 50 《年譜》頁4。
- 51 《年譜》頁14、186。
- 52 李長之本科畢業後即從事教學，歷任雲南大學、重慶大學、中央大學教師，年僅二十餘歲。所授課程有中文、英文、美術史、哲學概論、文學批評、西洋美術史、中國文學批評史、文學概論、中國文學史、邏輯、倫理學。以一人之力而橫跨文、史、哲、藝諸領域，其才學可見一斑。需指出的是，這樣的例子，在「清華學派」中亦非鮮見。見《水木清華》頁469。
- 53 《年譜》頁368。
- 54 《年譜》頁8。
- 55 有趣的是，1930年代創辦的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則旨在「培養國學師資，造就高深人才」，見徐雁平《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述考》，《中國學術與中國思想史》頁586，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可見，對「國學」與「高深」的訴求，成為民國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主題，亦折射出其時學術研究的基本去向。
- 56 主要刊物有《星期評論》、《中央週刊》及《生活導報》，王氏後來所出《龍蟲並雕齋瑣筆》即由此而來。見《年譜》271-272。
- 57 半世紀後，清華留美生李方桂（1902-1987）對此仍記憶猶新。詳見李方桂《李方桂先生口述史》，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。
- 58 《年譜》頁149。
- 59 從《國立清華大學一覽（1934-1935）》中可見其歷史學系的課表，內有錢穆課程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」，這正是其時錢穆的主研課題之一，足見其時教（學）研（究）相長之況。《年譜》頁151。
- 60 《年譜》頁183。
- 61 關於早期北大的詳情，詳見蕭超然等著《北京大學校史（1898-1949）》（增訂本）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。其氏國文系教師除上述諸兄弟外，還有陳漢章、黃侃、劉師培、黃節、鄧實、陳去病、錢玄同、劉半農等，幾乎皆為章太炎之故舊門人。

- 62 梅貽琦《復員後之清華》（續），載《清華通訊》復員後第二期，轉引自《年譜》頁332。
- 63 如余英時、林毓生、杜維明、許倬雲、汪榮祖、張灝、張光直等。不贅。

劉 超 1982年生，江西大餘人。現為北京大學研究生，北京大學《學林》雜誌主編。已發作品百餘篇。

---

《二十一世紀》(<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>) 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四十期 2005年7月31日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於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四十期（2005年7月31日）首發，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，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。